

茶座

总第二十二辑 2010 第四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贺立华：翻垦荒芜的《沃野》

邹逸麟：步行“串联”日记（二）

王学典 李 梅：刘起钊的两次调动与《尚书》学研究

孟祥才：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三）

汪朝光：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四）

散 木：也说蔡和森是否“惨烈就义”

——兼论关于革命烈士人物的写作问题

李 硕：明成化十二年“僧官嫖娼案”

——一件社会史与法制史的生动个案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XII | 历史学家茶座**22**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22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09-05563-5

I. 历... II. 王... III. 史学—丛刊 IV. 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042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

邮局邮发代号 24-50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单位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概念化:中国经验走向世界史坛的必由之路

王学典

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 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心甘情愿地做着外国同行的追随者: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居住在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权威;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在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实现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我们所由此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是对中国经验的忽视和疏远,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在国际学术分工中,正心甘情愿地做初级学术产品的加工。当前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倾向是“跨学科”,是“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这一主流的实质,是用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用西方(社会)法则来统贯中国历史。如同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工厂正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如今的中国史学界也一直充当着西方学界的学术小工:像蚂蚁一样辛苦收集材料,然后贡献给那些西方巨匠们,让他/她们去做理论化的工作,然后再把这些“理论”作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法则”重新输入国内。如果这些“法则”与中国经验相符,倒也无妨,但问题就在于这些法则无不与中国经验隔膜,乃至相悖。

由此我们所得到的一个重大教训是,中国史学界今后在向西方史学界继续输出材料、输出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尽快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这一点因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而变得异常紧迫。中国史坛正在成为世界史坛不可或缺乃至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肯定会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乃至会获得更具普世性的意义。

让我们尽快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小工变成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大师”吧。

目录

卷首语

- 003 王学典 概念化：中国经验走向世界史坛的必由之路

历史现场

- 007 贺立华 翻垦荒芜的《沃野》
027 邹逸麟 步行“串联”日记(二)
037 伊丽莎白·海靖 《来自世界四方的日记》解读(四)——海靖的外交伎俩(下)

学坛述往

- 纪念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专题
050 葛剑雄 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始末
069 王学典 李 梅 刘起钎的两次调动与《尚书》学研究
084 孟祥才 追忆“文革”中的学部领导和部分高研(三)
095 魏邦良 胡适与顾颉刚

重读民国史

- 103 汪朝光 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四)
110 申晓云 国民党政权易手之际的驻外使领馆

人物春秋

- 115 陆其国 明代谏臣杨继盛的柔软温情
120 许述 张振文 细说志愿军180师师长郑其贵

旧案重审

- 128 散木 也说蔡和森是否“惨烈就义”——兼论关于革命烈士人物的写作问题

史论沙龙

- 134 李硕 明成化十二年“僧官嫖娼案”——一件社会史与法制史的生动个案
141 佳宏伟 一段姻缘中的故事分析——蒋介石宋美龄完婚记

掌故钩沉

- 146 段战江 中国古代的攻城术



翻垦荒芜的《沃野》

贺立华

《沃野》是1979年初春创办,1980年岁末关门的,存活了两年,每年两期,共出刊四期。之所以关门,是因为在“反自由化”的运动中该刊成了“自由化典型”,它的编辑和作者有不少人成了“自由化分子”;关门之后的“余震”继续,一直到1982年春77级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尚未完结,仍然有被迫回来接受批评教育、继续“交代问题”的同学。“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不少当年有《沃野》经历的同学和老师,偶尔还在念叨那时的人和事:山大老校长、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念念不忘这个事件过程中的师生情谊,他说:“当时还出现了颇为惊人的《沃野》事件。……因为同学们大都来自社会基层,因此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包括某些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这就引起了某些部门的注意,要追查此事。当时我是该刊的业务指导,既然要查我理应承担责任,我也向有关方面表明了态度。但七七级的同学却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看过该期刊物,从而将我解脱出来。历来只有老师保护学生的,但七七级同学却挺身而出保护了老师。这难道不是一件感人的事件吗?”(曾繁仁《我与七七级同学亦师亦友情谊》,《我们七七级》,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真没想到,在77级高考30周年大聚会欢乐的时刻,我们敬爱的老师却在回想那令人心痛的往事!

一、创刊背景

《沃野》创刊于1979年。

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那是个控诉声讨“四人帮”专制罪恶的时代,是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的时代,是“黑五类”和众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告别残酷的现代“种性”制度获得平等做人权利、可以考大学、可以入党、可以参军、可以提干、不再受歧视的时代,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解体、千百万农民打破束缚、恢复“男耕女织”个体劳动自由的时代,是“臭老九”们从被贱视、被管制、被奴役的流放地归来得以升迁的时代,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呼唤“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欢呼文艺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到来,百花怒放、万木竞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抚摸“伤痕”、痛切“反思”的时代。

197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思潮的涌动,一大批深刻检讨历史、激烈针砭时弊的文艺作品发表,如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白桦、彭宁,《十月》1979年3月号)、《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诗刊》1979年第8期)、《在社会的档案里》(王靖,《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戏剧艺术》、《上海戏剧》1979年9月25日专刊)、《女贼》(李克威,《电影创作》1979年第11期),以及小说《飞天》(刘克,《十月》1979年第3期)等,几乎每一篇出来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都能引起山大大校园的轰动,同学们争相借阅、传抄、朗诵,甚至排练演出。



1979年的山大在恢复高考后已经招收了77、78、79三届大学生,校园里已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这批学子大部分是在“文革”十年间受压的一群。大学生这个群体历来就是一群敏感着社会人生、引领着时代风潮的先锋军。呼吸着自由解放的空气,受压的一群此时迸发出岩浆烈火般变革的热情,山东大学涌动着的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热潮波及全国,影响巨大。我记忆里,同学们在1978年就组织起了各类学术社团,到1979年又依托社团创办了多种学术期刊,仅中



“冻雷小说社”合影

文系就有学术社团、文艺团体十多个:杨争光、李安林等人的“冻雷小说社”,谭好哲、张宇声的“理论研究组”,耿建华、吴滨、孙基林、韩东、王川平、郑训佐等人的“云帆诗社”,李新、吉发涵的“语言研究组”,蔡宛柳、姜鸣钧的“剧社”,王汉川、姜鸣钧、孟生的“中文乐团”……,出版的刊物有《云帆》、《百花园》、《求索》、《银河》等。历史系、哲学系、政治系创办的刊物有《纵横谈》、《基石》、《春秋》等,均是些蜡纸刻写的粗糙油印印刷品。许多社团杂志的人员都有交叉,趣味相投的同学可以跨院系自由组合,同学们尽情地享受着那个时代,也为那个时代贡献着理想和激情、勤奋和汗水。

《沃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酝酿:山大学生会宣传部长吴传宝(中文系78级同学)和77级同学谭好哲、张幼川、姜鸣钧、李安林等同学在文史楼前花坛旁商量如何创办一个铅字印刷的、高品质的、全校文科同学都参与的文学刊物,吴传宝兄回忆说:“大家纷纷为刊物起名字,大概是谭好哲提出叫《沃野》吧,虽说有点拗口,总的感觉还不错,就这样定了。”办这样高品质印刷品需要经费,于是吴传宝开始四处游说、积极运作,他说:“我先找了团委书记冯宜明,冯书记十分友好,很热情;又找了党委副书记云光,他思想很解放,很支持学生办刊物。有

校领导支持,办刊的启动经费问题就解决了。”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使处事稳重的吴传宝兄日后躲过了一劫:北师大77级徐晓等同学办的《初航》有同学前来山大联系,希望全国重点大学的同学联合办一个大型的大学生刊物《这一代》,合作伙伴包括北大77级陈建功们的《未名湖》、北师大的《初航》、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等,希望《沃野》也加入。北京这批倡导联合办刊的同学正是后来《今天》诗刊的骨干。这个建议被吴传宝谢绝了,他坚持山大自己办刊,不与外校合作。中文系77级的吴滨同学后来听说了这个消息,很遗憾地说:“如果他们来联系我、联系《云帆》,肯定就加入了。”

《沃野》由学生会主办,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的吴传宝自然成为主编。编委会由文科各系同学组成,经有关领导提议,由冯传家同学出任副主编。冯是中文系78级学生,共产党员,是当时年龄最大的同学,大概有40岁了。因他在上大学之前的“文革”后期出版过长篇小说《春泉》,所以被保送上了大学,大概他是当年山大唯一不经高考上大学的。

《沃野》创刊最初动议是民间的,征得校方支持正式创办之后,就进入体制内管理了。它不同于上述民间社团自发创办的报刊那么无拘无束,貌似民办实则官办,《发刊词》也说得清楚:“它是在我们山东大学党委领导下,科研处和校团委大力支持下,由学生会主办的。”(《沃野》1979年第1期)而学生会又是直接服从团委领导的。

山大学生会主办的《沃野》,编辑部设在中文系,但没有办公室,编辑同学都在自己宿舍编稿,开会找教室,或在文史楼下的小树林里。虽然没有办公室,但印刷经费还是有保证的,经费来自山大科研处,有这样的支持,所以它的印刷就不同于那些蜡纸刻版油印粗糙的民办小报小刊了,由山大印刷厂铅字排版印刷,纸张排版印制都十分讲究。而且作者还有稿费,每千字2元。今天来看2元钱好似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足10元的年代里,这2元钱就是了不起的数字了。山大校长吴富恒教授对这个大学生刊物十分重视,亲笔为《沃野》撰文畅谈《我的一些希望》,鼓励同学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吴传宝出身艺术世家,广有人脉,他联系了山东省文化厅厅长书法家鲁特先生和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分别为《沃野》题写了刊名。第一期出刊后,本校师生争相传阅。编辑同学

们热情似火,紧接着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期。这两期稿件内容是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为主,只有少量几篇理论和翻译文章。

二、社会反响

两期《沃野》出版,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右派作家“文革”后刚刚平反复出的著名诗人公刘高兴地来信称赞“你们的刊物办得不错”,“几篇小说和卷首诗是再三品味了的,如小说《罪愆》(庞嘉泰)、《哥哥和嫂子》(贺立华),诗歌《唱给五四》(张树铮)、《白杨垂柳》(杨争光)等,都颇有锋芒,像初生之犊的样子”。《光明日报》资深文艺评论家潘仁山先生专门写来评论:“历下沃野千顷碧,试目遥看百花红。”重点评价了小说《罪愆》、《哥哥和嫂子》,他说:“《罪愆》通过恋爱婚姻悲剧,深刻揭示了官僚特权像癌细胞似的侵蚀着社会主义的肌体,戕害人们的心灵,离间夫妻骨肉之情,读之催人泪下,促人猛醒。《哥哥和嫂子》这篇小说以朴实的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调塑造了‘哥哥’这个八面玲珑、圆滑干练、见异思迁、道德堕落的新官僚典型,并予以入木三分的鞭挞;而对善良勤劳、任劳任怨、坚贞不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嫂子的辛酸遭遇,则给予了深切同情。在这篇作品中,歌颂与暴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沃野》1979年第2期)

老教授田仲济先生来信说,尽管年老“目力不及”,还是很高兴阅读《沃野》,他说大学生办刊物是“五四”传统,五四时期的《新潮》和后来的《曙光》都是大学生刊物,都起到过积极作用。“你们编辑出版的《沃野》是有意义的工作”,“祝你们越办越好!”著名老诗人、翻译家邹荻帆赞扬《沃野》的“活力”和“青春气息”,并且回忆起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生办刊的艰难,痛斥国民党专制的反动和怯懦,“连点红烛的红字也害怕,报刊时常开‘天窗’”。山大老校友、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先生写来数千言热情洋溢的长信,赞扬《沃野》“自由,奔放”、“生气勃勃”,赞扬同学们“路子走得对”,他相信会成为“繁花似锦的沃野”;他还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在国民党文化专制下没有言论自由,学生报刊经常遭受“查禁”、“追捕”、“夭折”、“人身危害”等。他感慨地说,今昔对比有“天壤之别”,“你们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该是多么幸福啊!”(《沃野》1979年第2期)

1979年出版了《沃野》第1、2期,这个时期我只是《沃野》的普通作者,我作为

作者分享了它的光荣。

三、改组“换头儿”

中国当代文坛从没有过这样自由热闹的景象,这种景象也引起了有关人士和部门的警惕,于是就有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呼吁。

第二期《沃野》出刊不久,有些人已经开始挑“刺儿”了,说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于是山大领导加重了中文系党总支的担子,由中文系总支书记亲自抓《沃野》工作,并且任命了一大批老师作《沃野》的“指导教师”,分管理论的是系副主任曾繁仁教授,分管散文诗歌的是郭同文教授、吴开晋教授,分管小说的是王传德教授……,并且作出了改组《沃野》编辑部的决定。所谓改组,实际上就是“换头儿”,将主编吴传宝换成贺立华,让吴传宝和冯传家做副主编。换掉吴传宝的原因据分析有三:鉴于已出刊两期《沃野》的“自由化倾向”,中文系总支书记把吴传宝叫到家里去谈话。吴传宝和书记的女儿是济南实验中学的同学,所以也不陌生,但吴的态度与书记相左,让她很生气。书记问:“你们刊物发的文章为什么不交给中文系领导和老师们审查?”吴则反复强调“《沃野》是山大学生会的刊物,不是中文系的”。再一个原因就是吴传宝支持大学生搞舞会,而且还亲自到省歌舞团请来专业演员教同学们跳交际舞。这个时候大学生跳舞属于开禁之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吴作为学生会的头儿,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第三个原因是潜在的,他出身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不是党员。虽说这个时候不再讲究出身,但阴影还在。另外,还有一个最要害的原因是被吴传宝无意中排除的。书记曾问他:“外地有人来和你串联办刊吗?”吴如实回答:“来过,我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将吴传宝降为“副主编”。允许他继续干,已经很给面子了。在同学们中间,吴传宝口碑非常好,是一位忠厚稳重、能力很强、积极热情、人缘很好的“老大哥”,这个主编,本不该换掉的。换上我的原因,我猜想是因为我入大学以后写了“入党申请书”,是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属于“比较听话”、“要求进步”的学生,是被系党总支定为“入党培养对象”的人,另外也许领导考虑我入学前曾在新闻部门工作过,懂些宣传纪律。按吴传宝和吴滨的说法就是“贺立华属于领导和同学们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压事儿”。但我自己反复



1980年在山东大学
《沃野》编辑部合影

《沃野》(总第3期)还没有出版。这一期是很难产的,一直拖到暑假期间才出刊。暑假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更紧了,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编辑速度上有点“抢时间”的意思。但尽管是“抢时间”,1980年第2期(总第4期)还是拖到了1980年底。这一期增添了页码,由原定的100页增加到130页,而且颇有预见地在刊后用了整整三页的篇幅、用小字号排出了“《沃野》一至四期总目录”,似乎有点儿“悲壮告别”的意味。这张照片是最后一次编委会合影,时间是1980年12月份。

尽管是小心谨慎地编辑、尽量打磨掉同学来稿犯忌的锋芒,尽管一层层地把关一层层地过筛,还是有许多好作品脱颖而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内涵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例如王川平、杨争光的诗歌,川萍的小说等。尽管我们编的杂志连自己也不满意,仍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全国各大学同学们的来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其中一封是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徐敬亚、王小妮同学的来信,我们几位编辑同学传阅了,有一种被同代人理解的感动,全文如下:

《沃野》编辑部:

在万花纷谢的大学生刊物中,我们一直注视着古老中原上的《沃野》,每期都读到了。当前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只有我们知道办一个刊物是需要多少心血(还有勇气和力量)!你们走下来了,这就说明了



《沃野》部分编辑会

你们的一切。我们共祝《沃野》不断办得更好,不断跟随真实的步伐,努力捕捉当代青年的感情,并不断注入新的表现手法。全国的同学们都在支持你们(我们在遥远的北方向你们致意)。

《赤子心》收到了吗?愿他带去我们的心声。

祝《沃野》兴旺茂盛!

徐敬亚 王小妮 1980年11月26日(《沃野》总第4期)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令同学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把它编入了最后一期《沃野》。实际上,此时《沃野》的编辑出版已经十分的困难,在“万花纷谢”时,《沃野》不可能绿色满园,正像《沃野》最后一期出版的日子,——它已经进入了寒冷的1980年冬季。

改组后的编辑部,我由普通作者被“提拔”成了主编,我和副主编吴传宝兄配合十分默契,上下斡旋外交的事情还是由吴兄去跑,具体编务主要是由多才多艺、聪明勤快的小学弟杨学锋和张树铮两人去做。大家任劳任怨,合作愉快。在任主编期间,虽然我没利用“职权”在《沃野》上面再发表只字片文,但不等于后来没有麻烦。期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也为日后的“反自由化”提供了些许材料:有个别编委提出,在编辑部内部成立“党支部”、“党小组”之类的先进性组

织,以加强党的领导,我持反对意见;还有个别编委经常向系总支领导汇报“工作”,这些“工作”多是些同学间鸡毛蒜皮之类。在编委会上,我对此谈了看法:我们都属于各班级来的同学,党员同学都属于各班级的支部管了,在《沃野》编辑部没必要再建党小组之类;大家都是成年人,不少同学上大学前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了,不是小孩子,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不要再去麻烦领导,如果咱们解决不了的再去请示不迟……。我的这些话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上纲上线”了。

四、关门后我的1981年

《沃野》于1980年底关门。1981年的春节过后,已经开学了的山大笼罩在凄冷的春寒里。《沃野》编辑部的人不再集合组稿了,编辑们在各自班内开始了学习文件和整顿思想。4月中旬以后,山大校园广播电台的大喇叭里,早中晚吃饭期间,反反复复地播送《解放军报》的文章《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这篇文章严厉地批评了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文章说:有的作品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描写得一团漆黑,歪曲和糟蹋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发泄不满,恶意嘲弄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随后各大媒体都大张旗鼓地批判我们不久前还在争相传诵的《苦恋》、《将军,不能这样做》等,那舆论氛围颇有“文革”大批判的“杀气”,充满了火药味儿。最令人不解的是许多饱受极左文字狱迫害而九死一生的著名作家们也加入了批判“自由化”的行列,例如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丁玲高度赞扬“党啊母亲伟大”,激烈批评“暴露黑暗”的“自由化”文学,告诫文坛说“我们不能像少数人那样发泄怨愤,图一时痛快。……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严肃的责任感,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该旗帜鲜明”(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06页)。山大老校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对这种“解放”的现象也很感忧虑,他说“我觉得思想解放,应该以四个坚持为前提,好似跑马,要顺着道跑,不然就乱了”(贺立华《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是相通的》,《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著名小说家刘绍棠更是以切身体会愤怒反击“自由化”思潮:“党